

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imis?

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德尔图良

前　言

Μεγιστού αγαθού ου αυθρωπ ω ταυτο, εκαστηε ημεραε
περι αρετηε ταυε λογους ποιεισθαι

一个人的最高幸福在于一连数日谈论善行。

——柏拉图：〔苏格拉底辩护词〕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使徒保罗：〔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

前言实际上永远都是后记。一本书经过长期写作，终于最后杀青——后记力求在比较而言不多的几句话里表达数年当中指导作者构思的那一思想。

“雅典与耶路撒冷”、“宗教哲学”，这都是些差不多等值、并相互涵盖的用语，与此同时，这些用语又都同样神秘，并以其内在的矛盾性刺激着当代人的思维。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两端论法——是否会更恰当一些了呢？如果我们诉诸历史的审判，那回答该会是明确的：历史会告诉我们，数百年以来，人类精神的优

冬天的虹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的上空出现彩虹。
在老百姓的传闻中，这一天体现象与发生在同一天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摘自未来编年史

看来，我肯定是患了热病。所以，请不要对我类似呓语的话感到惊奇。如今谁不在呓语？您对此已见怪不怪了吧。更何况假使思维健全人士的话愈来愈令人感到酷似呓语，那说不定这呓语中包含着些许真知灼见呢……

好了，打住。序言总是无甚益处，开门见山更佳。我只是不知道，怎样说得更委婉些。

我每天在夏花园内散步都要经过彼得大帝的宫殿。那里的一株株老椴树上筑满了鸦巢。保罗一世遇刺的那一夜，当谋杀者潜行在通往米哈依洛宫的园中幽径时，鸦巢中响起“鸹、鸹”的叫声，令谋杀者担惊受怕，惟恐惊醒熟睡中的皇帝。乌鸦也对我鸹噪。传说这报春的乌鸦是长寿鸟，或许它们中还有记得彼得的吧。于是近来我觉得它们的鸹噪仿佛包含着凶恶的预言：“彼得堡建立在荒地上。”因这预言，1703年彼得堡建城时多少人被鞭挞、监禁，剜鼻割舌。

“1721年，三个在彼得堡建城之前就住在当地的老渔夫讲述

道，建城前三十年曾发生过一场水灾，整个地区一直被淹到尼延尚茨，此后灾难每五年都重来一次。所以除渔民窄小的茅舍外，涅瓦河畔最早的居民从未在那儿建造过永久性住宅。往往是农民们根据天象在飓风即将到来之际，拆掉自己的小屋，将圆木和木板扎成木筏，拴在树上，自己则到杜杰罗夫山等待洪水退去。”（《彼得堡旧事》彼卡尔斯基院士著）。

被强制赶到“天堂”的俄国人对预言深信不疑，都说此处不可居留，这座城市将被洪水卷走或陷入沼泽。1905年秋季的一个晚上，我正行走在涅瓦河畔，突然所有的街灯都熄灭了。黑暗接踵而至，漆黑的天空仿佛塌陷下来。一群小流氓尖声吹着口哨，远处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乌压压的人群从阿尼奇科夫桥朝利捷依纳亚方向跑来。一个老妇人捂着歪在一边的帽子，一瘸一拐地跑过来，冲着我喊：“别走了，那边开枪了！”我果真听到或感觉到了枪声，一切如噩梦般的恐怖。我的脑海里重又现出那个梦境。当然，要把它详详细细地讲述一遍是不可能的。只能简而言之。当时远处城市黑魃魃的阴影映在黑暗的天际：一块块的楼群、塔影、教堂的圆顶、工厂的烟囱构成这一切。忽然黑暗中燃起一团火光，恰似从一张烧焦的纸片上飞出的火星。我明白了，拟或是什么人告诉我的，这是地下大坑道爆炸了。我等待着，我知道，再过一刻，整个城市都会飞上天，黑色的天空将被大火映得通红。

就在那年，一切几乎都快结束的时候我离开了。今年秋天我重又回来，回到霍乱的中心，反动的中心。不论是这个霍乱，还是那个反动仍然没有结束。每天《新时代》报上整版整版地刊登布告：“17人染病，9人死亡。”整个彼得堡似乎变成一个装着毒药，探着死神头颅的玻璃瓶。学识渊博的人们深信霍乱会流行不止，涅瓦河三角洲将一如恒河三角洲人迹杳然，“彼得堡建立在荒地上。”

然而不论是霍乱、反动，还是有关“自杀者”、“孤独者”、“买猫剥皮者”之类稀奇古怪的传闻，甚至人们脸上深深的忧伤，噢，当然，这是全俄罗斯的忧伤，恰好在彼得堡达到某种前所未有的令人疯狂的地步（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和他人的疯狂，因为，所有的人似乎都在一起悄无声息的变疯），不，所有这些都不是，而是另有一种什么东西使我再一次体验到熟悉的“末日感”，从彼得堡的脸上看出医生们常说的“死神的面孔”。

“我发现”，在莱蒙托夫的《宿命论者》中毕巧林说道，“大凡在几个小时后将要死去的人的脸上，往往会显出一种奇特的，不能避免的命运的痕迹”。

最主要的，彼得堡之所以令我震惊，就是它的脸几乎一点没变。彼得堡的以往今昔，犹如逼真的两颗水滴。的确，它的整体在消瘦、颓唐，未老先衰。然而它并未失去什么也没增加什么。只是多了电车，电影院，变成莫斯科的瓦西里·布拉任诺依影子般的孪生兄弟而已。但要知道这既便是对十月党人和革新派教徒而言也委实太少了。

必须在欧洲住上几年，才能够体会到彼得堡远非欧洲式的城市，它只是一座楚赫纳人的巨大石头村落而已。是还没有成熟就已经被玷污的欧洲。如果说它像一座外国的城市的话，那岂不就是说仆人斯米尔佳科夫像个“最高贵的外国人”。正如俄国民间快板中编唱的：

老爷如果戴着表链子，
就说明他没有表。
老爷如果穿的是套鞋，
就说明他没有靴子。

是的，彼得堡的一成不变正在于此。一成不变的就是“死神

的脸孔”。

踏着浑浊的深褐色稀泥，走在迷蒙昏暗的漫漫浓雾中，我在想，刚好是三年之前，一点不差；三年——三个世纪；我们总觉得，此间发生的事件大过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混乱时代，大过彼得改革，大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但又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发生过也像没发生过。够了，发生过吗？彼得堡人都在叫喊：没发生过！但我知道，我记得，为了忘却，我就得发疯。就在此刻我的呓语，我的恐惧，我的“末日感”开始了。此刻我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

“彼得堡的早晨恶浊、潮腻、雾气朦朧……迷天大雾中一个奇异的幻觉成百次地缠绕着我，挥之不去，雾仿佛就要飘散，飘向高空，而这个恶浊潮腻的城市是否也会与迷雾同行，一起升空烟飞云散呢？遗下的仍是从前的芬兰湾沼泽地，铜骑士^①骑在喘息不止，疲惫不堪的骏马上，矗立其中，仅仅成为一道风景？……瞧他们不住地急驰奔跑，来回折腾，可谁又能知道，这一切未必不是一个梦呢？也许有人会幡然醒转，这一切不过是某个人的幻觉，一切都将倏忽而逝。”

发生过也像没发生过。

不久前我去莫斯科。这是我们古代的朝圣者之路，第一本关于俄罗斯自由的书，拉季雪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照亮着它。我猛地从呓语中清醒过来，仿佛从不见天日的地下升上天堂。

人还是人，城市还是城市。雪橇在压实的积雪上欢声作响，不用担心明天白雪将变成一滩污泥。斯巴斯克大门口面颊嫣红的

^① 《铜骑士》：普希金作于1833年的长篇叙事诗。其蓝本彼得一世骑马的雕像由法国雕刻家法录理特（1716～1791）及其女弟子玛利亚·肯洛所作。1782年安置于彼得堡枢密院广场。

女人们不住地往小店里招揽顾客，她们推销的肯定还是十七世纪那种线结的手套。空气中也仿佛弥漫着古老的斯拉夫式粗面包圈的味道。也许马上就会在街拐角碰上伊·斯·阿克萨科夫，他会对我说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的话：“要想在自己身上解放被束缚的人民性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全心全意地仇恨彼得堡。”我会和他争论、吵架，但我仍会觉得他的话里有某种亲切的、陈旧的故事，陈旧的真理。尽管莫斯科有离奇古怪的颓废派的梅特罗波尔，中国城的白色石墙上人造太阳闪烁着玫瑰紫的光芒，但它的面孔仍然能令人想起普希金的奶妈，阿丽娜·罗季奥诺夫娜，“我衰老的老奶妈”的脸。在这张红颜褪尽，衰老的脸上饱藏着青春、永恒，它使人明白，她并没有否认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如果彼得堡说：没有发生过。那么莫斯科的石头将哭号：发生过！发生过！还不仅于此。不管有多奇怪，但每当我置身于克里姆林宫的各个角落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比萨、佛罗伦萨、佩鲁贡等地古老的广场上：这些由意大利建筑师和俄罗斯石匠们共同建造的大教堂和高塔不是没有意味的。我在这里比在彼得堡更接近与欧洲真正的联系。既便在这一俄罗斯精神与世界精神最初的对接中带有种种盲目的、软弱的和梦幻般的，现在对我们已经是不可能的东西，但它仍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那些模棱两可的彼得堡的“恭维话”，关于这些恭维话，安齐奥赫·康捷米尔^① 在自己的音节诗^② 中写道：

一个可怜人一心想学习，
全力扑在字上面；

^① 康捷米尔（1708～1744）。俄国诗人、外交家、唯理主义的启蒙作家。俄国讽刺诗体裁、古典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讽刺诗》（1729～1731）。

^② 音节诗：即以每行数量相等的音节为基础的诗句。

迎面看到的却是大把恭维话，
那崇高的科学连影子都没有。

影子恐怕还是有的，但也仅仅是影子，是梦幻：“有人会幡然醒转，这一切不过是某个人的幻觉，一切都将倏忽而逝”。

莫斯科从俄罗斯的土地上崛起并被俄罗斯土地环绕着，它没有被用坑洼代替坟墓，或用坟墓代替坑洼的沼泽地所包围，它是自己落成的——而彼得堡是被培育出来的，是从土地中拨出来的，甚至是被臆想出来的。

“1714年彼得注意到城市的房屋建设很慢，便考虑扩建彼得堡。除彼得堡外，沙皇禁止在全国范围内用石头建造房屋，同时威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让人们破产或将他们流放。他下令让所有经拉多加湖驶往彼得堡的船只和所有前往彼得堡的大车运载石块，并将石块交给警察所长。不执行此令者，一块石头被收取一块十戈比的银币”。

难道这还不是“臆想”出来的城市吗？

像牲口般从俄国各地被驱赶来的工人们唱着忧郁的歌：

起来吧，善良的年青人呵，
善良的年青人，自由的人们，
下游全体的小伙子们
为国王干活去。

这些在瓦西列夫斯克岛上的自由人中有一个青年在装备船只，他回答一位姑娘的提问，说明他为何要这样做：

你怎么不明白，漂亮的傻姑娘，
你这爸爸不懂事的女儿，

装备船只不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自己也不愿意，
我是遵从国王的圣旨，
服从海军上将的命令。

彼得堡就是这种“不是自己意志”的体现。

修筑第一批城堡需要泥土，但附近却没有：四周都是覆盖着苔藓的沼泽泥塘。泥土被装在旧口袋、粗席子甚至连衣裙里从遥远的地方拖运到五角形古城堡。人们没有食物，无处藏身，像苍蝇似地死去。尸体来不及收殓就像动物的尸体那样成堆地埋进一个坑里。修筑彼得罗甫洛夫斯克城堡使十万移民殒命。关于彼得堡有诗为证：

壮士修筑彼得堡，
白骨累累满泥塘。

不久前，因为霍乱一事，一位医生在城市杜马说“整个彼得堡建立在一个大茅房上”，话说得粗俗却生动。

彼得的城，愿你光辉灿烂，
像俄罗斯似的屹立不动！

太可怕了，这个巨大的茅房，这个盛满人骨的巨冢。有时在迷天大雾中死去的人仿佛要站起身来，对活着的我们说：“你们将死于今朝！”一如毕巧林注意到马里奇脸上“奇特的，不能避免的命运的痕迹”后对他说的话。

《铜骑士》是彼得堡的故事，是普希金所有作品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部。“普希金将长诗交给书报检查机构”，叶弗列莫夫说，

“但却没得到出版许可”。倘若长诗能真正被理解，那么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仍不会获准发表。

在这里，诗句看似恭维而实是大胆地诘问：

凭着谁的宿命的意志，
在海边建起了城市，——

追问着整个“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堡时期”。

啊，命运的有力的主宰者！
你紧抖着铁的马勒，
高高君临深渊之上。

莫非要俄罗斯将前腿高扬？

“拷刑架”是一种刑具，人被吊在上面用鞭子抽打。彼得之子、太子阿列克谢在他死前两天，被带到刑讯室，吊在拷刑架上鞭挞“25次”，严刑拷问他的一切事情，他说，“维亚泽姆斯基老师在跟他太子谈话时说：斯捷潘·别利亚耶夫和歌手们当着你的父亲唱道：只要上帝愿意，他就能战胜人天生的骄傲。而且所有的人都这么唱，诱惑你的父亲。他本人也很喜欢把他跟上帝相提并论”。——“只要上帝愿意，他就能战胜人天生的骄傲”——这就是说：上帝的意志战胜了自然规律，完成奇迹。彼得堡就是这类奇迹。此处征服“自然规律”的“奇迹创造者”指的不是人，而是“上帝”。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①（注释见下页）称之为“基督”，而“分裂派”称之为“反基督者”。彼得堡这永恒的拷刑架，吊在上面被拷问的，是基督还是反基督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明了，在彼得堡俄罗斯达到某个“终点”，

现在正“在深渊之上全身摇晃”。

……在深渊之上……
俄罗斯前腿高扬陡然昂立。

然而不能永远前腿悬空陡立着。而令人恐惧的是一旦“放下前蹄”，则意味着坠入深渊。

此刻大胆的诘问已然变成大胆的回答，化为疯狂的挑战：

好，你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你等着瞧！……

这就是我们的疯狂，我们的呓语，我们恐惧的起点：彼得堡建立在荒地上。

他突然飞快地
扭转身便跑。他仿佛听见：
这位威严的沙皇立即就
烧起了不可遏止的怒火，
慢慢地转过他可怕的脸……

上帝的脸变成魔鬼的脸，而我们全体同这个“可怜的疯子”一样边跑边听到身后：

霹雳一声——从高处跳下的

①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俄国国务活动家、作家，彼得一世的战友、学者侍从团首脑。作品有《悲喜剧》、《费拉基米尔》、《谈政权和沙皇的荣誉》等。

沉重而响亮的声音响遍
震撼得发抖的铺石路面。

我们像老鼠避猫一般逃着，但开始是猫抓老鼠，过后却成了老鼠葬猫。“老鼠葬猫”——这幅民间木版画是彼得一世临终的写照，是“俄国历史的彼得堡时期”结束的写照。“忽然谣言传遍了彼得堡，说是在卡林金桥附近一带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官吏模样的死人出现，他在寻找一件被劫的外套，不问官职和身分，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这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死人抓住“一个要人”的领子：“啊，这下子可找到你了……我正需要你”，“你等着瞧……”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朝铜骑士飞奔而来。飞奔过来的不止他一个。数不胜数化为白骨填塞泥塘的死人在昏黄的、霍乱的迷天大雾中站起来，聚集在一起，将这巨大的花岗岩团团围住，骑士和他的座骑一起从这里跌落深渊。

紧随彼得堡幽灵之后，在屠格涅夫的《幻影》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幽灵：“有个黄黑色、像蜥蜴的肚皮那样五彩斑斓，既不是乌云，也不是烟雾的东西正缓缓地在天空中蜿蜒蛇行。……它带来散发着腐臭、致人于死地的严寒……这严寒令人心里作呕，眼睛发黑，毛骨悚然。这是力量：这种力量势不可挡，主宰一切，它没有视觉，无形无义，但它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它如猛禽一般挑捡自己的祭品，像蛇那样用它夺命的信子舔杀牺牲……”

“紧裹着身体，骑着一匹灰马的巨大神像猛然起立，腾空而去。”

此刻，屠格涅夫当然想到了《启示录》：于是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它身上的骑士名字叫作死。

几年前寒冷晴朗的一天，低垂在彼得堡上空的太阳四周出现类似北极光那样淡淡的虹。目击者是否还记得，抑或像忘掉今天

的一切那样已经忘记过去的事？

我看着这征候时，仿佛觉得灰马和骑在它身上名叫死亡的骑士很快就要出现了。

俄罗斯之死——彼得堡之生；反之，彼得堡之死——俄罗斯之生？

倚目所望视而不见，侧耳倾听听而不闻。看不见灰马骑士，听不到末日审判的号角：彼得堡建立在荒地上。

灰 马

(一)

俄罗斯的解放无法用词语表达。在俄语中没有一个词能配得上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不是反映过去，而是展望未来——有时是影射着未来的大事件，此外这个扭曲的投影，被愤怒所画出的漫画，真想问一问：“所有这群魔鬼都在哪里——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吗？”

然而这是巨幅漫画。而其余的东西——则是斯美尔佳科夫想用来反映上帝愤怒的小镜子。

显而易见，而且应该如此，也永远如此。从岸边望去大海似乎平坦的：若要地平线升高，自己就得升高；只有退到远处才能看清庞然大物。彼得一世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铜骑士》，而 1812 年——半个世纪之后才在《战争与和平》中得以再现。俄罗斯的解放好或不好，怎么说都不是比彼得一世和 1812 年更小的事件。这是上帝的给予，它也无愧于这一伟大的字眼。

而我们暂且沉默吧。在这自觉或不自觉的沉默中唯一的声音——是一本小册子，片断中的片断，几页零散的日记，这就是《灰马》。

这本小册子小得可怜，它被吓得全身苍白，蜷成一团，躲在隐身帽下，它脸上的表情好象要说：别注意我吧，让我跳过去就行了。

我将小册子称为片断——但更确切地说，应称其为啃剩的。而且啃它的并非往日好心的政府书报检查机关，反倒是新的解放了的书报检查机关。早在《灰马》第一次见诸于《俄罗斯思想》，它里面危险的以及有伤风化的地方就都已被擦洗掉了。小册子现在的样子犹如一幅幅让人莫名其妙的画图，或者像庞培城的景致。但是在俄国毕竟已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胆大妄言、外表却怯懦畏缩的书了。

也许并没什么可担惊受怕的。这本书究竟对谁更危险——连魔鬼都弄不清：让魔鬼为难不论对谁总归有利。这类书我们根本读不懂。我们嚼了嚼它，却没嚼透，就又吐出来了。

起初好象冒烟了，有的地方在劈啪作响，马上就要烧起来了，但又被人及时浇灭了。

不过，一个有洞察力的女巫很快猜出，《灰马》是一位著名的颓废派女作家的作品，她对俄国的恐怖手段一无所知，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纯属无中生有。这正是一语中的。女巫的话至少还能给人以慰藉，而其余人编造的胡言乱语时至今日决无任何必要重提了。

他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而且这些老牙也怪可怜的。再说这时还有最为重要的事情呢：司徒卢威《民族的脸》，奇里科夫的犹太笑话，《蓝鸟》、《路标》——喏，一句话，操心事太多了。

于是就把《灰马》忘了。犹如《野蔷薇》徒然虚惊一场。

在文学中忘却，在生活中呢？被文学忘却，是不是会被生活忆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对有的人更困难，因为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真实的东西，并非单就我一人而言。这是我们的，而

不是出自我们，它是外来的，犹如一场飞旋的雪崩，犹如摧毁一切的责任感的重担降落下来。难道我们真像那些笨拙的巫师，招出灵魂，又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们了。

我们聚集在两条地下通道里，彼此不知道，彼此看不见，我们中间隔着厚厚的岩层，但两边已响起击打声；我们迟早会相逢。

如果有人问我，继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之后，时下欧洲有什么书籍，可以根据它判断俄罗斯的未来，我指定的恐怕是《灰马》。这是夸张了点，但如果试想一下此处言及与其说是这本书，不如说是书的背景的话，那么，我的夸张可能就不过分了。

也许现在它对有的人来说已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把刺向心脏的尖刀，自己阵营里阿译夫式的叛变活动。就在旧的终结之处开始新的吧。这样的开始对许多人来说比结束更可怕。

如果此书在文学中没有引起轰动对他们又怎么样呢？即使这本书引起轰动，它的印张也不会比旧年更多。被此书唤醒的人类的良知不会停止呐喊，一如扔进水里的石头激起重重声浪。

《灰马》的作者不能说，“我写了就写了”，而只能说“我做了就做了”。

(二)

他是艺术家吗？

艺术嫉妒现实，艺术要求极其完善的静观。既便它不是形而上学的，也是与行动对立的经验论的完全的静观。这原本并非必须如此，它本该是另一种样子，但现在就是这样，对此不容忽视。不能用宝剑当琴弓拨响阿波罗提琴的琴弦：要么将剑锋弄钝，要么扯断琴弦。

艺术是整个生命的苦修和功勋，这在罗普申（萨文科夫的笔名，作者注）写的东西中给人的感觉太强烈了，罗普申所写的东西是介乎两种不同苦修之间的休息，两种不同行动之间的间歇。是一首战士的歌：

战斗使我成不了诗人，
歌曲使我成不了斗士。

这就是罗普申的危险：跳离了一边，却又到不了另一边；一半是静观者，一半是行动者；是两栖和传说中会变的人。这一点，我再重申一下，不是毁灭，而仅仅是危险。罗普申是个勇敢的人，上帝是保佑勇者的。

有时总归觉得，对他本人而言倘若不把书写完就更好了。他在书中看到太多不能忘却的东西。而没有忘却——就不会忘却；不被忘却——就一事无成。

这是对他本人而言，而不是针对我们。对他是损失——对我们是收益。此书中有些在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也并非常见的东西。最深刻的静观只存在于行动的最深处。恺撒的事布鲁图知道，莎士比亚并不知道，凭它叙事者多聪明，也不能把没做过的事情说成做过的。

“我记得，我坐在囚室里，等待死刑。白天我躺在铁床铺上阅读旧年的《田原》……心里好象不相信会死，我的心情颇有些古怪的冷漠。既不想活着，又不愿死。我不知如何度过一生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对黑暗之后会有什么也不猜疑。我只记得：我感兴趣的是被砍头还是被绞死，被扼住喉咙时痛不痛。而每每晚点名后，院里的鼓声沉寂下来，我专心致志地望着撒满面包渣的监狱桌子上灯盏里黄色的灯光自问：心里怕不怕？又自答：不怕。因为我已经——已经无所谓了。……然后我就跑起步来。”